



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系列教材

总主编：何其莘 仲伟合 许 钧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 原典选读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West: A Reader

廖七一 编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系列教材 ——

总主编：何其莘 仲伟合 许 钧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 原典选读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West: A Reader

廖七一 编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原典选读 =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West: A Reader / 廖七一编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6
(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系列教材 / 何其莘, 仲伟合, 许钧主编)
ISBN 978-7-5600-9669-8

I. ①当… II. ①廖… III. ①翻译理论—西方国家—现代—研究生—教材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02052 号

出 版 人: 于春迟

项目负责: 都帮森

责任编辑: 都帮森

封面设计: 刘 冬

版式设计: 张苏梅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40×1000 1/16

印 张: 23.25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0-9669-8

定 价: 41.90 元

* * *

购书咨询: (010)88819929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 (010)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剽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196690001

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系列教材

编写委员会

总主编:

何其莘 仲伟合 许 钧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文 军	王克非	王宏印	王维东
王斌华	仲伟合	任 文	孙致礼
许 钧	何 群	何刚强	何其莘
李 力	李长栓	陈宏薇	陈建平
姜秋霞	胡显耀	赵军峰	柴明颀
秦亚青	傅勇林	谢天振	詹 成
廖七一	穆 雷		

总序

改革开放 30 年，助推中国翻译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勃勃生机，蔚为壮观。今天的翻译，无论在规模、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上，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史无前例的。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国际交往日益频繁。作为服务于改革开放的先导力量 and 与世界沟通的桥梁，翻译的作用愈发突出。然而，在翻译需求不断攀升的同时，作为翻译人员主要培养阵地的高校，却日益暴露出其在翻译教学与实践之间的脱节问题。毕业生翻译技能不扎实，知识面狭窄，往往难以胜任不同专业领域所需的高层次翻译工作，致使翻译领域特别是高级翻译领域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不能满足目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这从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对高水平翻译人才的培养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为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促进中外交流，培养高层次、应用型高级翻译专门人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2007 年 1 月 23 日第 23 次会议审议通过设置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是我国第 18 个硕士层次的专业学位，其设立无疑是继 2006 年教育部批准试办翻译本科专业后我国翻译学科建设取得的又一里程碑式的成果，为我国培养高层次、应用型、职业化的翻译人才提供了重要途径，为我国翻译学的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给我国的外语学科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能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及提高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需要，适应国家经济、文化、社会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口笔译人才。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在培养目标、师资要求、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和手段这四点上都与传统的翻译方向研究生教育有很大的不同。首先，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按口译或笔译方向训练学生的口笔译实际操作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并为满足翻译实践积累所需要的百科知识。这一点与传统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中的翻译研究方向侧重培养学生的外国语言文学理论研究能力、学术研究能力以及就业为导向的教学能力的培养目标差别很大。第二，对学生实践能力的高要求和培养目标的应用型导向，也要求承担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学任务的教师必须具有丰富的口译或笔译实践经验，并了解翻译教学的原则。第三，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中

的翻译教学有别于外语教学中的教学翻译。翻译训练不是作为一种检测学生语言能力、水平的手段,而是建立在学生双语交际能力基础之上的职业技能训练,包括译前准备、笔记方法、分析方法、记忆方法、表达方法、术语库的建立等,专门训练学生借助语言知识、主题知识和百科知识对源语信息进行逻辑分析,并用另一种语言将理解的信息表达出来。最后,在教学方法和手段上,专业化的翻译教学需要的是双语交际环境、特定的交际对象和交际主题,还要考虑到翻译用人单位的需求等,要求学生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中文基础和至少通晓一门外语,同时还要具备广博的其他学科(如经济、管理、法律、金融等)知识和实际翻译操作技能。另外,专业翻译人员培养还特别强调要忠实地表达讲话人/作者的想法或信息。因此,翻译作为一个职业(无论是兼职还是全职),专业化程度高,应用性和操作性都很强。要培养职业化高级翻译人才,现行外语教学体制是难以完成的。

职业化的翻译教育也因此需要专门化的教材。该教材体系应根据职业翻译人才的知识结构“双语知识、百科知识、翻译技能知识”三个部分来设计。专业翻译课程的设置也都是根据培养单位的师资特点及教学资源围绕上述三个板块安排的。因此,专业翻译教材应该至少包括口译技能类、笔译技能类、通识教育类、口笔译理论类等类别。正是在上述原则及《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的指导下,我们在2007年底组织国内多位了解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并一直从事翻译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学者进行研讨,并着手编写国内第一套专门面向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系列教材。该套教材包括口译技能、笔译技能、翻译理论、通识教育及翻译工具书五个类别。整套教材以翻译职业技能训练为核心,以适当的应用型翻译理论为指导,配合不同学科领域的专题训练,旨在完善学生翻译学科知识结构,提高学生口笔译实践能力。在本系列教材全体编委的努力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系列教材”具备以下特点:

(1) 口笔译训练的技能化。全面介绍翻译技能。以口译类教材为例,包括口译的记忆、笔记、数字口译、口译语篇分析、口译预测、语义识别、口译译前准备等技能;同声传译则介绍同声传译的概论、视译、应对策略等。

(2) 口笔译训练的实战性。笔译的选材基本是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真实文本材料;口译则尽可能选用全真会议资料,而且题材范围涉及政治、外交、经济、文化、高科技、法律等多方面。

(3) 口笔译训练的专业化。所介绍的口译技能、笔译技能等均为目前国内外口笔译质量评估及口笔译专业认证考试测试的主要方面,通过对本系列教材的学习可以了解职业化翻译培训的程序与内容。

(4) 口笔译理论的指导性。对应用型的高水平翻译人才来说,树立正确的翻译观,掌握相关的翻译基础理论是非常重要的。本系列教材所涵盖的翻译基础知识和口笔译理论应努力领会和掌握。

(5) 通识教育的融通化。口笔译实践要求掌握英汉两种语言的相关知识及跨文化交际知识,本系列教材中的通识类各分册对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其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MTI 职业化人才培养的教学理念和面向实践的教学导向在目前的翻译教学界还是新事物,对其进行不断的探讨、丰富并开展教与学的交流是必要的,也将对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发展大有裨益。外研社这套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系列教材在开发之初就考虑到了这一点,在教材出版的同时,也将推出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学资源网,不仅指导系列教材的科学使用,也希望能够汇集教学实时动态、集各方意见反馈、倡教学经验交流、促学科长远发展。

中国职业化翻译人才的培养才刚刚起步,需要译界、学界同仁“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教材建设是专业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我们也希望借编写本套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材的机会为刚刚起步的中国职业翻译教育尽一份绵薄之力。本套教材的编写力求科学性、指导性和前瞻性,但内容等方面也难免有不尽完善的地方。希望通过本系列教材的编写,与关心中国翻译事业和从事翻译职业的同仁、同行一起关注我国翻译和翻译教学事业的发展现状,以及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实施和发展,进一步探讨高层次专业化翻译人才培养的模式和途径。

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系列教材编写委员会

2009年3月

前言

翻译专业硕士的培养，在强调实践、突出实务能力的同时，还要兼顾理论素养，以达到培养应用型、专业化和高层次翻译人才的目标。外研社出版的这套“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系列教材”明确地分为五大系列：口译系列、笔译系列、理论系列、通识系列以及工具书。《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原典选读》即属于理论类教材，介绍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基本理论发展，以扩大学习者的知识面。

随着研究的发展，口译研究表现出日益明显的特殊性与独立性。1972年霍姆斯将口译研究置于翻译研究结构图中媒介研究（medium-restricted translation studies）之下。到了20世纪90年代，包括吉尔在内的一批学者提出了口译研究（interpreting studies，简称IS）这一术语。口译研究似乎并没有从翻译研究中受惠太多，而是更多地从社会语言学、话语分析、语用学、篇章语言学、跨文化交际、神经生理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中汲取营养，促进和扩展了自身的发展；而与此同时，翻译研究者似乎很少积极参与口译研究。与翻译研究一样，口译研究虽然也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但其发展似乎已经突破了霍姆斯原来划定的框架，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

为此，我们在本书中将翻译（笔译）研究与口译研究并列，分为上、下编，各精选了10篇涵盖20世纪70年代以来影响较大的翻译思想、翻译策略和翻译原则的文章，构成了全书的20章。除正文选文外，每章包括“作者简介”、“内容提要”、“关键词”、“延伸阅读”和“思考题”五个部分。作者简介中注明所选篇目的来源，以供读者查阅。

在平衡实践操作能力与理论素养关系的同时，所选篇目带有较强的实践取向，旨在让学习者了解西方翻译研究和口译研究的基本发展趋势、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在翻译学习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学员在增强翻译能力、提高操作水平的同时，也能培养翻译的社会文化意识，将翻译视为有目的的社会行为，将翻译文本、翻译策略、翻译文体，甚至忠实类型的选择，与具体的文化语境结合起来，使翻译文本和翻译活动最大限度地实现预期的文化功能。当然，具备一定的翻译理论素养还能使译员比较客观、科学地描述或解释翻译现象，预测翻译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编者得到海内外诸多专家、学者的支持、帮助和指导。北京外国语大学何其莘教授提出编写方案，并多次通过手机交流编写意见；南京大学

许钧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谢天振教授从宏观学理上对编写目录提出建设性意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仲伟合教授对 MTI “应用型、专业化和高层次”的定位，消除了编者对本书是否具有实用性的疑虑；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院长王立弟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院长柴明颀教授对 MTI 学科建设多次发言，使编者澄清了思路，明确了编写原则；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穆雷教授对篇目的选用和样章发来长篇书面修改意见；蔡小红教授在细读样章以后，提出积极的修改建议，并毫不客气地指正若干语言文字失误，让编者汗颜和警醒；北京语言大学刘和平教授不仅多次发来邮件，提出意见，还迅速复印珍贵资料以供比较筛选；四川外语学院李芳琴教授和四川大学任文教授也从各自多年从事口译教学的实际经验出发，提出若干具体建议；在多次与对外经贸大学王恩冕教授的交流中，编者也受益匪浅。2008 年 5 月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行的“第七届全国口译大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编者有幸与 Daniel Gile 教授和 Franz Pöchhacker 教授交流编写意图与选文，他们不仅介绍了欧洲同类教材的情况，同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Daniel Gile 教授当即回宾馆为编者拷贝上百篇口译论文以供比较选择。Franz Pöchhacker 教授在回国途中也通过邮件发来自己的文章作为替换。最令人感动的是，Daniel Gile 教授还特地对两篇选文进行改写，以适应中国读者和师生的需求。在此，再次向两位教授表示诚挚的谢意。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外研社的徐建中副社长、常小玲老师和祝文杰老师，自始至终关心、支持和指导本书的编写。另外，四川外语学院科研处也对本教材的编写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众多专家学者的支持和指导，使编者增强了信心；专家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侧重点和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提出的意见，又使这本《选读》更加完善。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只是一种初步尝试，旨在为实际教学提供一个基础，各院校需要根据自身实际和需要取舍增添。本书的不足之处，祈望方家批评指正，以利将来有更好的同类教材面世，推动我国 MTI 教育事业的顺利发展。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所选原文大多已取得原文作者或出版社的授权，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谢意。然而，虽经外研社和编者的多方努力，仍无法与部分选文的作者或出版社取得联系。我们将继续努力与他们进行沟通联系，同时也希望他们能主动与外研社联系。

四川外语学院



2009 年 7 月于歌乐山麓

目 录 Contents

上编 西方翻译研究	1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West	
第一章 翻译研究名与实	21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James S. Holmes
第二章 翻译的实质	39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Eugene A. Nida & Charles R. Taber
第三章 翻译的功能类型	59
A Functional Typology of Translation	Christiane Nord
第四章 翻译方法	81
Translation Methods	Peter Newmark
第五章 翻译戏剧文本	93
Translating Dramatic Texts	Susan Bassnett
第六章 翻译法律文类	107
Translating Legal Genres	Vijay K. Bhatia
第七章 论中国诗歌翻译	121
O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etry	Parker Po-Fei Huang
第八章 诗歌翻译形式与翻译诗歌形式	139
Forms of Verse Translation and the Translation of Verse Form	James S. Holmes
第九章 文学多元系统中翻译文学的地位	153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Itamar Even-Zohar
第十章 翻译规范的性质与作用	161
The Nature and Role of Norms in Translation	Gideon Toury

下编 西方口译研究	179
Interpreting Studies in the West	
第一章 语言与记忆——交传笔记研究	191
Language and Memory: A Study of Note-taking in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Danica Seleskovitch
第二章 同传——传译过程、模式与策略中变量的相互依存	203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Interdependence of Variables in the Interpreting Process, Interpreting Models and Interpreting Strategies	Hella Kirchhoff
第三章 同传——意义单位及其他	215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Units of Meaning and Other Features	Marianne Lederer
第四章 会议传译——不同用户群的期待	229
Conference Interpretation: Expectations of Different User Groups	Ingrid Kurz
第五章 同传中的文本类型与互文性	245
Types of Texts and Intertextuality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Bistra Alexieva
第六章 同传中认知负荷的应对策略	255
Cognitive-load Related Coping Tactics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Daniel Gile
第七章 同传中意义的合成	275
Meaning Assembly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Robin Setton
第八章 从复杂技能探讨口译与笔译	297
A Complex-skill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Annette M. B. de Groot
第九章 会议传译与社区翻译中的质量评估	315
Quality Assessment in Conference and Community Interpretation	Franz Pöchhacker
第十章 同传负荷模式中“走钢丝”假说的检验	337
Testing the Effort Models' Tightrope Hypothesis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Daniel Gile

上编 西方翻译研究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West

发展概况



人类翻译活动的历史几乎与人类自身的历史一样古老。早在公元前 3000 年，亚述帝国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翻译。在公元前 18 世纪的巴比伦王国，汉穆拉比国王的许多法律、政令就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下达庶民。公元前 3 世纪，《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和荷马史诗的拉丁语译本就已相继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和古罗马问世。

一、翻译研究发展的几个阶段

对西方翻译活动和翻译理论的历史划分，翻译理论家常常莫衷一是。纽马克（Peter Newmark）以重大的翻译活动为标志来划分译论的发展阶段。斯坦纳（George Steiner）（1975）认为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大体经历了四个时期：（1）古典译论至 18 世纪末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和坎贝尔（George Campbell）翻译三原则的发表；（2）从施莱尔马赫（Griedrich Schleiermacher）至 20 世纪中叶；（3）二战后至 20 世纪 70 年代，以翻译语言学派的兴起为标志，以维奈（J. P. Vinay）、奈达（Eugene A. Nida）、穆南（Georges Mounin）和卡特福德（J. C. Catford）为代表；（4）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谭载喜（1991）以西方翻译史上曾出现的六次翻译高潮为标志将西方翻译划分为六个时期：（1）发轫于公元前四世纪末的肇始阶段；（2）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初期；（3）中世纪时期；（4）文艺复兴时期；（5）近代翻译时期，即 17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上半叶；（6）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今。在本书中，我们将西方翻译研究的发展粗略地分为三个时期：古典译论时期，即公元前 3 世纪至 18 世纪末；近代译论时期，即 18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当代译论时期，即 20 世纪初至今。

1. 古典译论

在公元前三世纪已经有文字记录的翻译作品问世：七十二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了《圣经·旧约》，即后人所称的《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罗马文学家安德罗尼柯（L. Andronicus）用拉丁文翻译了《奥德赛》；涅维乌斯（G. Naevius）、恩尼乌斯（Q. Ennius）以及其后的普劳图斯（Plautus）、泰伦思（Terence）均“用拉丁语翻译或改编过荷马的史诗和埃斯库罗斯

(Aeschylu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和米南德(Menandros)的希腊戏剧作品”(谭载喜 1991: 4)。公元 405 年,哲罗姆(St. Jerome)根据希伯来文翻译出《通俗拉丁文本圣经》(The Vulgate),成为罗马天主教承认的唯一文本。到了中世纪,用民族语言翻译《圣经》的活动日益普遍。基督教西哥特主教乌斐拉(Ulfila)曾用哥特语翻译《圣经》。在七世纪至八世纪初,阿尔德姆(Aldhem)、阿尔弗烈德国王(King Alfred)、阿尔弗里克(Aelfric)等均用英语翻译过《圣经》的一些章节。巴格达、西班牙的托莱多以及意大利的西西里成为了当时翻译和学术活动的中心。其后,法国的欧雷斯米(N. Oresme)、意大利的但丁(Dante)、德国的维尔(Nicolas von Wyle)、英国的乔叟(G. Chaucer)、威克利夫(J. Wycliffe)等都是十分活跃的翻译家。

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罗马文学、艺术和科学的重新发现极大地促进了古典文化的传播,《圣经》、古典文学作品和其他人文科学著作的翻译达到了新的高潮。这一时期重要的翻译家有荷兰的伊拉斯谟(D. Erasmus)、德国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法国的阿米欧(J. Amyot)、多雷(E. Dolet)、英国的诺斯(T. North)、荷兰德(P. Holland)、查普曼(G. Chapman)等。许多翻译理论家集翻译家、文学家、哲学家或艺术家于一身,使翻译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实践性和跨学科的鲜明特征。古典时期最著名的翻译理论家有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哲罗姆(Jérôme)和马丁·路德。

西塞罗不仅是古罗马的政治家、哲学家和演说家,同时也是翻译家与翻译理论家。西塞罗不“以僵化的理念为原则来指导翻译中的模仿,以致损伤原文的风格”(刘宓庆 1989: 2)。他的至理名言“我不是作为解释员,而是作为演说家进行翻译的……不是句当字对,而是保留语言的总的风格和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塞罗提出,翻译家必须照顾译语读者的语言习惯,用符合译文读者习惯的语言来打动听众;翻译要传达的是原文的意义和精神,并非语言形式。(谭载喜 1991: 24)

贺拉斯是罗马帝国初期著名的诗人和文艺批评家。他反对逐句硬译、死译和生搬硬套,认为翻译应该“意义对意义”(sense for sense);主张创造新词或引进外来词,以丰富民族语言和增强作品的表现力。他提倡“忠实原作的译者不适合逐字死译”。这句话被经常引用,“成为活译、意译者用来批评直译、死译的名言”(谭载喜 1991: 26)。

哲罗姆被誉为西方四大权威神学家之一,精通希伯来语和拉丁语,酷爱拉丁文学。他不仅完成了第一部“标准”拉丁语《圣经》的翻译,同时还提出了极有见地和切实可行的翻译原则:(1)反对逐字对译,容许语言形式的偏离和词汇的更改;(2)翻译方法应随原作的文本而异。宗教文本采用直译,而文学文本则采取意译;(3)敢于对《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进行增补、删改和修

正；(4) 译者应该有自己的风格，优秀的译文可以与原作媲美。

马丁·路德是文艺复兴时期德国宗教改革领袖和翻译家。他根据希腊原文翻译的《新约》和根据希伯来语翻译的《旧约》后来成为德语的典范。他的贡献在于：第一，主张用通俗、明了、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语言翻译；“让《旧约》中的先知们用自然的德语讲话”（Nida 1984: 10）。第二，只有意译才能再现原文的形式、风格和精神实质。第三，译者应尊重原文，但可以增补原文文字面上没有、但字里行间蕴涵的意义。第四，翻译应依靠集体的智慧，集思广益。（谭载喜 1991: 83）

在路德之后，著名的译论家有法国的多雷，英国的诺斯、荷兰德和查普曼，他们都对用民族语言翻译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使古典译论冲破中世纪宗教势力的樊篱，顺利向近代译论过渡。

2. 近代译论

17 世纪至 20 世纪初是西方翻译理论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被称为“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翻译理论家的视野更加开阔，提出了更全面、更系统、带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模式。（谭载喜 1991: 106—108）

法国出现了围绕德·阿伯兰库（Perrot d'Ablancourt）的翻译原则而展开的古今之争和准确与自由的论争。德·阿伯兰库主张译文要迎合本国读者的口味，强调文学可读性，并容许增删和修改，而不过分在意译文的忠实，被称为“自由翻译派的总代表”（谭载喜 1991: 110）。主张漂亮而不忠实的自由翻译派也一度成为主流。坚持准确翻译派的德·梅西里阿克（Bachet de Meziriac）则认为，“偏离原作意思的翻译……是背叛”（谭载喜 1991: 114—115）。这场论争一直持续到 18 世纪中期。

巴托（Charles Batteux）在《论文学原则》中详细地论述过翻译问题，认为原作者是主人，译者只是奴仆，只能紧跟原作者，忠实地再现和反映原作的思想与风格，不得有任何修改和增减，甚至强调形式对等。巴托将语法结构、句子顺序应用于翻译研究，对当时法国乃至西欧翻译界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俄国进入 18 世纪以后，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均有较大的发展。罗蒙诺索夫（M. V. Lomonosov）首先摒弃了模仿外国语言形式的陋习，主张采用接近口语的文学语言。普希金（A. Pushkin）主张译者应有独立见解，在处理原著时应享有充分的自由，甚至容许对原著进行增删、改写，使译文在美感和艺术价值上超过原作。茹科夫斯基（V. A. Zhukovsky）反对在翻译中任意修改原文的时间、地点和人名以适应“俄国读者的口味”。他认为诗歌的译者是原作者的竞争者和敌人，因而在翻译诗歌时有更大的创造性和自由；而散文译者是原作者的奴隶，只能亦步亦趋。（费道罗夫 1955: 46）

17 世纪《圣经钦定本》的翻译与古希腊《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古罗马安德罗尼柯 (Livius Andronicus) 所译的《奥德赛》和哲罗姆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并列为翻译史上的四大杰作。《圣经钦定本》吸取了之前不同版本的优点, 学术性和忠实性大大超过以往的英语译本; 译者遵循严格的翻译规则, 有效地排除了个人偏见, 避免了随意增删。此外, 《圣经钦定本》中 93% 的词汇来自英语本族语, 语言通俗、纯朴、优美, 对英国宗教、文化、语言和文学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德莱顿 (John Dryden) 兼诗人、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首先, 他明确提出翻译是一门艺术, 译者必须具有艺术家的气质, 否则翻译规则“只能使他越发成为一个小丑” (Schulte 1992: 31)。第二, 译者必须考虑译文的读者对象, 主张适当借用外来词。第三, 译者是原作者的奴隶, 他“在别人的庄园里劳动, 给葡萄追肥整枝, 然而酿出的酒却是主人的” (谭载喜 1991: 153)。他将翻译分为三类: 逐字翻译、意译和拟作; 认为逐字翻译是“戴着脚镣……跳舞” (Schulte 1992: 18), 而拟作又近似于创造, 脱离了原作的面貌, 因此主张重意义、轻语言形式的意译, 避免了随心所欲又不致于过分呆板。他对翻译的三分法突破了传统二分法 (即直译、意译) 的局限, 具有巨大的启示意义。

泰特勒的翻译理论和思想主要见于《论翻译的原则》一书。他提出了著名的翻译三原则: (1) 译者应精通原作语言和题材, 完全再现原作的思想; (2) 译者应具有准确判断和鉴赏原作风格手法的能力, 并使译作的风格与手法与原作等同; (3) 译作应与原作同样通顺。泰特勒提出的忠实、风格一致和通顺的三原则成为后来许多翻译家遵循的信条, 并对 19、20 世纪的翻译理论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德国, 近代最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应首推施莱尔马赫和洪堡。施莱尔马赫认为语言决定思维, 这对洪堡、后来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以及跨文化交际的理论都产生过深远影响。他认为口译类似机械活动, 笔译才是创造性活动。翻译应分为顺从原作和顺从译作两种途径。前者让读者去接近原作者, 译者只是“填补读者不懂原作语言的空白” (谭载喜 1991: 135), 让读者去理解原作的意义; 而后者让原作者用译语语言说话, 读者能轻而易举地理解原作。这一思想对 20 世纪波斯盖特 (J. P. Postgate) 前瞻式 (prospective) 和后顾式 (retrospective) 翻译分类很有启发。

洪堡 (Wilhelm von Humboldt) 的翻译理论建立在他独特的语言哲学基础之上。他认为语言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 民族的语言就是他们的精神, 而民族的精神也就是他们的语言。译者处于两难处境: 要么过于贴近原文而失去本族语的魅力, 要么拘泥于本族语而牺牲原作的风姿 (威尔斯 1988: 27-28)。然而, 洪堡又认为, “没有任何事物是语言无法表达的”, “语言是人所共有的天性, 所有语言都持有可以用以理解其他任何语言的钥匙” (威尔斯